

财政部原部长吴波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两袖清风 来去无尘

本报记者 江帆 常艳军

时代先锋

人物小传

吴波，1906年生于安徽省泾县。193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长，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解放战争期间，兼任晋察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办公厅主任、部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1978年后历任财政部顾问，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顾问、党组成员。1988年离休。



图① 吴波在工作中。
图② 原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左一)、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右一)看望吴波同志。

一位父亲、一份遗嘱，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这一切都与吴波有关，与这位参与奠定新中国财政基础、年逾古稀仍担当大任的前财政部部长有关。

时间回到10年前，2005年的2月初春，99岁的吴波走完了生命的旅程，留给儿子们的只有一份特殊的遗嘱。说特殊，是因为同样的遗嘱，吴波立了两次。一次是2000年病重期间，一次是去世前一年；说特殊，是因为两次遗嘱的内容都是要将自己的待遇住房交公。第二次遗嘱，他特别写给财政部党组，并要求子女不向财政部伸手要任何照顾。

老部长吴波虽然已经走了10年了，但这个故事依然流存在很多人的口中心上。不少人讲给自己的子女听，讲给孩子听。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吴波人生的最后一个故事而已。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早已不是吴波的生活片段，而是他全部的生命和整个的灵魂。正如他离休后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

最大任职年龄的财政部部长

如果数一数新中国历任的财政部部长，吴波算得上是在任职年龄最大、在职时间最短的一任部长，但丝毫不减人们对他的敬重。

1979年，吴波走马上任财政部部长时，已经73岁。

上任那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经过调查研究，吴波建议中央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分别对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汕头、珠海、厦门4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还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使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税收工作恢复正常秩序，在吴波的具体指导下，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税收三大建设(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目标，并付诸实施；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

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

在人们眼中，吴波既是一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又是一位实干型的高级领导。他处处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吴波的工作风格不仅对财政部形成勤奋、清廉、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佳话美谈，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说起吴波的“抠门”故事。

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财政部为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曾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蔬菜。后来吃菜问题解决了，菜地变成葡萄园。为给葡萄园建围栏，当时部行政司做了一个200多元的插竹篱笆预算。吴波看后批示：“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的结论是，拉铁丝网只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这才批准了这个预算。

吴波经常说，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

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30多年，形成了一套丰富的理财观，主要是5个结合，一是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相结合，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的观点。二是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思想。三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始终坚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四是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并一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的实践中。五是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完成税收任务与严格贯彻财税政策相结合，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

吴波的这套观点对财政工作实践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为财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吴波从不端架子，与吴波相处的人都说，吴老很普通。

原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冯润来说，“他不把自己当成是部长。”冯润来今年83岁，1951年到机要室担任打字员，很多重要文件都由他来打，他的办公室和吴波在单位的宿舍相邻。“一天，我晚上加班，天气很热，我穿着背心裤衩打字。吴老拿着文件进来了，看见我这样说，‘你真爽快。’冯润来边笑边说。”

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分配给吴波的一个小二进的四合院。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时，不敢相信这是财政部部长住的房子。房子年久失修，很多地下的青砖已经裂了，地面凹凸不平，窗户上的油漆也基本脱落，房上长出了荒草。正房客厅里的陈设更是陈旧，一套破了皮的旧沙发，两把旧藤椅，一个旧书柜和一张旧的长条桌。”曾给吴波当过工作秘书的王沈京说，“就是这样一个小院子，吴老一住就是47年。”

“我当副部长以后，几次提出要修葺吴老的房子，他都不同意。后来梁柱的油漆脱落了，有的地方漏雨了，不修实在不行了，他才勉强同意修。”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回忆说。

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这是吴波一生坚守的原则。他任部长期间，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

1976年，吴波到山东省调研，不同意坐小轿车，和同事们同乘一部面包车出发。一周后，一行人乘火车到泰安，接待人员让吴波乘坐红旗轿车，吴老婉言谢绝，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202吉普车里，而象征职务等级的红旗牌轿车放空跑回。事后有人问吴波，让红旗车放空跑回来回不是浪费吗？吴波说：“如果我坐了红旗车，我在泰安调研几天，红旗车就会跟我几天，这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为避嫌，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省去过一次。1982年，第四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邀请吴波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合肥时，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

从1997年开始，陈纪祥给吴波做了8年多秘书，并把老人家送走，“吴老去世前嘱咐我说，有两个保险柜是财政部的，等我走后，一定要交回。”陈纪祥拿出一张办公设备退库单，上面记录着“吴波部长，2005年3月4日，两节柜、五节柜各一，交物人陈纪祥”。

“如吴老般克己奉公的老一辈党员大有人在，但如吴老一样纯粹的不多。”项怀诚说，吴老所作所为都很普通，但

在平凡小事中严于律己，累积起来却让人感到高山仰止。

而吴波就这样坚守了一辈子。吴波的这些故事后来被财政经济出版社编辑成书，名为《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部长的生前事》，感动了无数财政人。

最富有和最清贫的父亲

吴波的儿子吴威立今年80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说，“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从不和我们发脾气，也不讲大道理，更多是身教，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影响我们。”

1957年，吴威立考上清华大学，吴波高兴地给吴威立说，你需要买什么，开个单子。于是，吴威立列了一个清单，总计花费是98.5元。“妈妈说，给100元吧。父亲说，不行，就是98.5元，一毛也不能多给。”

“哥哥吴本宁大学毕业，申请支边，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父亲支持他的选择，问他，你考虑好了吗？去那里就要扎根到底，一辈子不许回来，也不准找人利用我的关系。”吴威立记得，当时去了5个干部子弟，而最后，就剩下哥哥一人在甘肃舟曲落地生根。

“我本来有机会去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但父亲不同意，他说，我在财政部工作，我儿子决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吴威立说。

吴波的儿孙没有谁沾到过他的“光”。项怀诚说，吴老从不允许自己的子女打自己的旗号谋取个人私利，也不让家人利用他的职权占有任何好处。

2000年的一次病重，让吴波开始立遗嘱。这是他的第一份遗嘱，是为了去世后把住房交还国家。为此，他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请财政部的几位秘书作为遗嘱见证人。两年多后，吴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不甘心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感觉还有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的领导表达，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次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遗嘱中，吴波说，我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给他们任何照顾。

2005年2月20日，99岁的吴波平静地走了。因为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吴威立召集家人，并请了父亲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形成一份详尽的《家庭会议纪要》，将遗嘱中的安排，逐条逐人地落实下去。吴威立还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我曾劝过父亲，希望他能考虑到在外地的兄弟生活困难的情况，把房子买下，但他没有同意。所以，我们尊重父亲的意愿，交还住房。”吴威立说。

吴波在第一份遗嘱中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他没有大额存款，仅有3万元左右的积蓄，除去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什么剩余，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子书籍，但他留下的那沉甸甸的精神财富，却弥足珍贵。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巾幗楷模

“盖买村就是我的家”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新疆伊宁县盖买村党支部书记李元敏

村党支部书记李元敏

本报记者 马星忠

驱车从新疆伊宁县东行驶14公里，伊宁县胡地亚于乡盖买村便进入视野，条条整洁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座座红顶的安居富民房点缀其间。

盖买村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众占总人口87%的村子。留着精干短发的村党支部书记李元敏说着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在村里，一提起李元敏，不少村民会竖起大拇指说：“杰米拉，亚克西！没有她，就没有盖买村的今天！”

“盖买村就是我的家。”她觉得村民都是自家亲戚，谁家有困难都应该帮一把。

有一次，李元敏去邻居家布衣赞打水，看到老人背部生了5个脓疮痛苦地躺在床上，她赶紧叫上在地里浇水的丈夫，送老人去医院看病。老人没钱不愿住院治疗，李元敏就拿出500元给老人看病抓药。还把买合布衣赞接回家，每天请村医疗室的医生输液，给老人挤脓疮，直到老人康复。

李元敏的女儿看着妈妈每天穿着一身旧衣东奔西跑，特意给了她1000元，让她去买身新衣。李元敏心里却惦记起村里那些房屋漏雨的村民。她用1000元钱买了一捆塑料布，分给了村里的29户贫困户。

这些年来，帮助过多少村民，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村里人到她家打牛奶她从不收一分钱，她还为村民牲畜免费打疫苗，教他们种地，她家的打草机、拖拉机、粉碎机，村里人可以免费用。

2010年，李元敏已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家里养着30多头牛，还发展特色种植，每年收入近20万元。“看着盖买村一年比一年穷，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在乡干部的多次动员下，李元敏把好朋友叫到家里问：“盖买村选位咋样的书记才能干好？”“没有私心吧。”听了这句话，李元敏把养殖产业扔给丈夫，走上盖买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

说起2012年盖买村换届选举的事，李元敏眼中不时闪现泪花。宣布选举结果的那天早晨，许多村民顶风冒雪地站在村委会大院里，搓手哈气地等着，就想亲眼看到李元敏当选村委会主任。李元敏暗下决心，“3年盖买村不大变样，我就回家喂牛。”

李元敏带领村干部，按照地册上的土地亩数，从自家开始，拿着皮尺一亩亩地量，量出了345亩机动地。通过民主决议，村里决定以每亩300元的价格把320亩土地承包出去，给村集体增收9万多元；25亩为村里52户年轻人划分了宅基地。分到宅基地后，村民阿布力克木·阿布力克喜极而泣，拉着李元敏的手不放。

2013年，村里9公里的沙石路面铺上了柏油；全村25公里的泥土路全部铺上沙石；在分割村子的一条吉里格朗沟上架起了一座12米宽、94米长的钢桥，解决了村民们出村难题……

在李元敏带领下，盖买村从全县的“拖后腿”变成了“领头羊”。2013年，盖买村的人均收入突破了1万元，村集体也有了50多万元的收入。

网络安全的守护者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副总工程师王丽宏

本报记者 肖尔亚

“你的网络覆盖范围有多广，你被攻击的范围就会有多广。过去我们说两军阵前勇者胜，现在进入了新阶段，应该是两军阵前智者胜……”

坐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副总工程师王丽宏面前，听她语调和缓地给我们讲述未来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今年47岁的王丽宏，已经在网络信息安全保障领域摸爬滚打了15年，多次承担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突破了互联网海量数据信息处理等技术难题。

王丽宏已经不记得处理过多少起网络安全事件，而她印象较深的，是2009年5月19日发生的“暴风门”事件，当晚21:50开始，江苏、安徽、广西等多省的网民几乎同时发现网络反应变慢，并在随后3个多小时内无法访问网络。相关人员迅速对变故原因展开调查，发现是某黑客组织对一家游戏私服网站DNS域名托管商进行攻击，没想到这台服务器上还托管了另外国内13万家网站的域名，最终造成大面积网络堵塞。次日凌晨1:20，受影响地区的互联网服务终于恢复正常。

王丽宏说，突破关键技术，搭建实际应用平台，这是她最初5年的主要工作。“科研成功，不代表实际应用成功，工程问题往往需要实践经验来解决。做好了软件后要施工、升级，我们经常早晨5点到7点，趁用户量最少的时候到机房进行割接。”

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各类网络安全事件，分析国家网络安全态势，实现一年365天、7×24小时的监测。这是王丽宏的第二个五年任务，重大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需要全程监测，进行应急处理，“经常加班加点，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们更要坚守岗位。”

在外人看来，网络事件往往是一团迷雾，而王丽宏他们正是在一团迷雾中把线索理清。现在网络经济诈骗案件频发，有的诈骗网站做得和官方网站一模一样，需要专业人士通过技术手段去自动发现。王丽宏说，这是技术难点，需要掌握网站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处理需要快速、准确、全面。

自2000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调入北京参与新创建的工作，王丽宏这15年都扑在了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事业上。第三个五年，她开始从事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2013年开始，应急中心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着力培养网络信息安全领军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将最尖端的科技成果应用在这里，而这些尖端技术只能靠自己去打拼。”王丽宏说，网络空间的博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超越时间与空间，兵不血刃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特别需要从从业者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奉献精神。



更多中国故事
系列报道请扫
二维码

本版编辑 闫静
美编 高妍
邮箱 jlrzbggs@163.com

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本报评论员

不给儿孙留一间房、不让儿孙沾一点“光”，是10年前原财政部部长吴波同志两份遗嘱的主要内容。两份遗嘱为吴老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其中蕴含的“精神遗产”熠熠生辉，令人难忘。

身居部长要职的吴波同志，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信念，永葆本色。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都拒绝特殊待遇，不吃小灶、不配专车、不住好房，将个人需求压缩到最低，把群众需求视为最重要；他廉洁自律，拒绝收受礼品、拒绝超标接待、拒绝公车私用、吃饭不掏腰包，公务工作

中能省则省，更不因私事花费国家一分一厘，他的儿孙都是普通干部和工人农民，从不允许特殊关照；他甘于奉献，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生活中也不遗余力为困难群众……回望吴老高风亮节的一生，他不沾一“尘”来，不染一“尘”去，却在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崇高风范。

时移世易，但吴波同志的宝贵精神值得深深汲取。他的生动言行在告

诫新时期的建设者们：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永远是共产党员的执着追求，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永远是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法宝，勇于担当、无悔奉献永远是战胜挑战、赢得未来的精神后盾。面对机遇和挑战共存的大时代，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行的，不践行这样的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以吴波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中汲取力量，以他们为镜，深学、细照、笃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披荆斩棘、开创未来。